



# 风月好谈

止庵 著

# 风月好谈

止庵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月好谈 / 止庵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600-8

I. ①风… II. ①止…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407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风月好谈

止庵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600-8

---

2015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2

定价: 29.00 元

## 序

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在东京的旧书店买到几幅日本作家写的“色纸”，都是合我心意的——我最喜爱的作家，毛笔书写，而且是汉字或以汉字为主。计有：谷崎润一郎书“心自閑”，川端康成书“風月好”，三岛由纪夫书“潮騷”和“忍”，井上靖书“天平の薨”。我不很懂书法，大概三岛水平最高，谷崎次之，川端又次之，井上则居末位。

“潮騷”和“天平之薨”均系书名，但单看字面也有意思，虽然那意思多少来自小说本身的阐释。《潮騷》要算三岛最明亮、最健康的一部作品，在他与其说是确定方向之作，不如说是划定范围之作：三岛是一位范围甚广，兼有多个方向的作家，《潮騷》可与他的《假面的告白》对照着看，从某种

意义上说它们正是互为表里。井上的《天平之薨》写得清正、崇高，说来作者也别有作品可以对比，即《楼兰》里的《补陀落渡海记》，主人公金光坊是一位“反鉴真”，《补陀落渡海记》也是一篇“反《天平之薨》”。井上把人性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都体会得非常周全，也非常深刻。

“忍”这说法本来寻常，但出自三岛之手就特别耐人回味了，联想到他最后的死，感觉还是没能忍住。三岛鼓动兵变，切腹自杀一事，记得当年我还是在《参考消息》上得知，此前并无机会读到他的任何作品。多年后我参观山中湖畔的三岛由纪夫文学馆，看了一部他的生平专题片，长达一小时，内容翔实，但结尾只将一束光聚到『天人五衰』手稿最后一页“『豊饒の海』完。昭和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几个钢笔字上，压根儿没提他是怎么死的。我看若松孝二导演的电影《11·25自决之日：三岛由纪夫与年轻人们》，说实话不能引起共鸣。也许就像当时人们对于三岛赴死没有共鸣一样——这是一件只对三岛自己有意义的事，而时至今日，可能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三岛赴死的理由很幼稚，其实也很可笑——之所以没人觉得可笑，是因为他并非一个可笑之人。不过话又说回

来，三岛尽管只活了四十五年，可他做的事情大概比别人两辈子做的还要多，成就当然也大得多。

卖家告诉我，“心自闲”系谷崎晚年为高血压病所苦时写的，而在我看来，这几个字恰好用来形容这位“江户子”的一生。谷崎不少作品都与他的实际生活有点牵扯，譬如《痴人的爱》、《神与人之间》、《食蓼虫》、《疯癫老人日记》等，谷崎可以说是个自我到需要借助写作来排解的人，但他的作品始终具有一种难得的洒脱气质。加藤周一认为，谷崎的作品只是“由此岸或者现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美的反映，而且是快乐主义的反映”（《日本文学史序说》）。在我看来，谷崎毕生致力于对美的探求，这种探求如此极端，如此无拘无束——对他来说，美没有任何限度，审美方式和审美体验也没有任何限度，在这方面，放眼世界恐怕没有一位作家比得上他。

查词典，“风月”一词一指景色，一指男女情事，川端于“风月”下着一“好”字，当是取前一词义，否则就落俗套了。不过他这也是言语道断，就像苏东坡讲“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别人只须随之礼赞而已。但我倒是循后一词义牵强附会地想到川端的一些作品，觉得也是很

好的概括。在我看来，风月仅限于形容某一阶段的男女情事。我读西方小说，认为库普林纯洁无瑕的《阿列霞》、《石榴石手镯》，不能算是风月之作；而丑恶得令人窒息的《亚玛街》也不是，虽然故事的那个背景常被形容为“风月场所”。川端的早期之作，比如《伊豆的舞女》，给人的感觉是清澈得很；及至到了晚期，特别是《睡美人》和《一只胳膊》，又好像特别浑浊。二者或过或不及，在我看来都与风月沾不上边，只有介乎其间的《雪国》、《千鹤》和《山音》，才是写的这回事。

这几幅字皆为我的心爱之物。我本不事收藏，近年稍涉此道，偶有收获，计划将来写本小书，以上可充就中一节。这回要将《旦暮帖》之后的文章编一集子，书名就借用了川端的“风月好”，后缀一“谈”字。当然只是中意这字面，所收篇目实与风月无甚干系。可是鲁迅不是有《准风月谈》么，那么就算步前贤后尘好了。说来我还从未谈过风月呢。这里“好”当读去声，若读入声则作“喜欢”解，是乃预先表露一点心愿，将来谈谈倒也无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 目录

序 1

鲁迅一九三六年欲赴日疗养事 1

鲁迅与落谷虹儿 12

关于周作人 24

记新发现的周作人《希腊神话》译稿 53

谈编注之事 73

夏志清的未竟之功 88

“时代错连则事必伪” 95

关于一部警世之作 99

古拉格与底线 107



小津讲如何拍电影	113
带一本书去小津住过的房间	121
“我，艾米莉·勃朗特……”	131
我读东野圭吾	146
写在一份目录边上	151
什么是书话	158
我怎样写《惜别》	163
藏周著日译本记	175
日印中文书	198
日本旅行琐谈	209
后记	216

## 鲁迅一九三六年欲赴日疗养事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旧话重提。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个环节稍作梳理。说来并无新鲜材料，均见载于《鲁迅全集》。然《全集》虽非稀见，有些发议论、抒感慨的人却好像不大查阅。鲁迅身后，大家针对他说了太多的话，众声喧嚣之中，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

《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

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不如先来“认真调查研究”一下《鲁迅全集》。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婴著书、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读到。据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 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一文，周建人说那番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鲁迅全集》出版时，他还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鲁迅拟稿，许广平抄寄”）云：“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

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此乃鲁迅首次提及“转地疗养”，的确出自须藤的建议，但显然并未指定日本。鲁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连日记都停笔了，至三十日才又续记。所以说“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鲁迅致曹靖华：“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这里首次提及出行时间，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当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但讲“大概”、“但未定实”，说明还在考虑之中。

七月十一日，鲁迅致王冶秋：“医生说要转地疗养。……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

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陆。那时再看罢。”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鲁迅自己比较若干可能的去处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旨在安静养病，不受打扰。仍讲“还没有定”，却已与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现在所顾虑的主要是入境问题。然而因为病情缘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迟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治疗暂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十六日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迹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毕。”治疗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罗斯拉

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

“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同日致曹白：

“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明明白白。

鲁迅去世后不久，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与此正相符合：“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他说。‘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我说着。……‘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他婉辞谢绝了。”所提到“雨”即许粤华，笔名雨田，黄源当时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学。

八月七日，鲁迅致曹白：“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信件也不转寄。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

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同日致赵家璧：“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但就在这一天，日记云：“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自此先是须藤助手钱君，继而须藤自己每日来注射，鲁迅又复“不能离开医生”了。

八月十三日，鲁迅致沈雁冰：“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同日日记：“夜始于淡[痰]中见血。”病情更严重了。

八月十六日，鲁迅致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倘在中



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莫干山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则赴日本的念头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终没有明确说出一个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接下来他提到此事，就显得更加悲观，八月二十五日给母亲写信后，“须藤先生来诊”，当日致欧阳山：“我比先前好，但热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说不定何时可以旅行。”二十七日致曹靖华：“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